

亞洲學術文庫

香港教育圖書公司

ASIAN STUDIES SERIES

區域研究

李金強著

清代福建史論

亞洲學術文庫

香港教育圖書公司

ASIAN STUDIES SERIES

區域研究

清代福建史論

1343

區域研究

清代福建史論

Asian Studies Series 07

Essays on the History of Fujian in the Qing Dynasty

by Lee, Kam Keung

Copyright © 1996 by Hong Kong Educational Publishing Co.

All rights reserved.

亞洲學術文庫 07

區域研究——清代福建史論

著 者 李金強

策 劃 李家駒

執行編輯 李家駒

出 版 者 香港教育圖書公司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附屬機構]

香港北角英皇道 75 至 83 號聯合出版大廈 24 樓

電話：2887 8018

印 刷 者 美雅印刷製本有限公司

九龍觀塘榮業街 6 號海濱工業大廈 4 樓 B1

發 行 者 商務印書館營業部

九龍紅磡鶴園東街 4 號恆藝珠寶大廈 2 樓

電話：2362 6207

ISBN: 962-290-480-7

1996 年初版

© 1996 香港教育圖書公司

謹以此書獻給父親

11/11/84/99

自序

二次大戰後，西方學術界盛行區域研究。其中對於發展中區域現代化歷程之探討，尤為重視，流風所播，吾國史學界亦受感染，紛紛借助此一理論模式研究中國近代史。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與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早於1973年，即在此一學術背景下，合作進行“中國現代化區域研究計劃”，以集體方式對清末民初沿江沿海十個省份之現代化歷程進行探究，此一計劃並於1974年中央研究院內召開“傳統經濟及人口討論會”，時於南港，從事清代福州研究，適逢其會，由是得悉省區研究新動向，並且目睹史學家與經濟學家，就近代中國若干省區經濟與社會發展，相互對話，獲益良多；此後研究福建，啟途於此，歷年來於教學與研究中，務需多所涉獵，故研究領域日有擴充，而獨對清代福建研究，較為專一；書中之論文，撰寫成文，始於八〇年代初期，迄於九〇年代中期，前後十餘年，皆教學之餘，對於清代福建史之點滴研究而陸續累積者；故本書即為清代福建史研究成果之初步結集。

全書所收論文，主要為清代福建之交通、軍事、人物、社會及革命等不同歷史課題之探究。其中對於西力東漸後，福建所出現之歷史變遷及其近代形態之形成，措意尤多，故其研究之內在理路仍從“傳統與現代”此一傳承與變遷之發展架構中尋繹，藉此說明福建於清代之演變及其

地位。期間福建一省之近代特性，日漸明確，如近代都市福州、廈門之出現，新式海陸軍之培訓，基督徒精英之誕生，海外移民之勃興，社會新風尚與制度之形成，以及導致專制王朝瓦解之革命力量之湧現，都或多或少見之於本書各篇研究成果之史事敘述中。近世福建之“變局”，無疑從本書諸文中獲得印證。

其次，本書結集尚需一提者，乃書中文字，大多由於港、台兩地學術機構，包括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香港中文大學及珠海書院文史研究所，先後邀約出席學術會議報告之論文而成者。上述各機構之盛情邀約，以及與會師友及同行之謬許與指評，無疑刺激個人對於清代福建研究課題之開拓與反思。此外，師友提攜，尤足感念，期間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王師爾敏、李師國祁對於清代福建研究之啟蒙與鼓勵；澳洲國立大學（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遠東歷史系導師王賡武教授、駱惠敏博士、Prof. Mark Elvin 及 Dr. John Fincher 對於海外華人史及辛亥革命研究之提點；廈門大學林金枝教授，以及福建省僑聯，協助回閩進行實地訪問與考察，對於成書前之研究進程及撰文，均有助益；而香港浸會大學提供之研究資助，更使有關研究及出席會議，得以順利達成；同事周佳榮兄協助出版事宜，使本書得以付梓，於此謹一一表示謝忱。

最後，內子靜嫻“長時期”之支持與鼓勵，使無後顧之憂，至為深感，亦誌記於此，是為序。

1995年6月13日

於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

目 錄

自序	ii
導論——福建區域研究述略	1
清代福州交通述論	24
清代軍制之演變——以福建為個案 之考查	52
清季愛國基督徒黃乃裳之研究	102
從福建海關《十年報告(Decennial Reports)》 觀察清季福建社會之變遷	132
清季福州革命運動興起 及其革命團體演進初探	166
同盟會與光復會之爭——清季廈門之 革命運動(1906—1911)	215
密謀革命——1911年福建革命黨人 及其活動之探析	243
附錄——徵引書目	281

導論——

福建區域研究述略

福建地處東南，山海交錯，漢、唐以降，隨著北方士民南渡，日漸開發，朝廷遂設官分治，行政區劃，益見完備^①；由於濱海，且海岸線延綿曲折，良港自然天成，因而港市迭興，於國史上早以海口都會，著稱東南區域^②。就此而論，省會福州於唐末已見海舶通洋之利^③；宋元之際，泉州首出，以中國阿拉伯海上交通

① Hans Bielenstien, "The Chinese Colonization of Fukien Until the End of Tang", in *Studia Serica Bernhard Karlgren Dedicata* (Copenhagen: Ejnar Munksgaard, 1959), pp.98—111.

② G. William Skinner, "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History",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XLIV, No.2 (1985), pp.275—279. Skinner 指出東南沿海巨區 (Southeast Coast Macroregion) 之歷史發展，即由泉州及漳州經濟循環週期所帶動。

③ 林仁川：《福建對外貿易與海關史》（廈門：鷺江出版社，1991），頁16—17。時甘棠港為福州外港，潮通番舶。

而成中外著名港市^④；明隆慶(1567—1572)以降，漳州月港，以走私貿易轉販“東西洋”(東南亞)，而與西班牙人進行中、菲(律賓)之“絲銀貿易”，尤為明清經濟史上之頭等大事^⑤。及至清初，廈門販洋，憑藉與沿海、台灣及南洋等地之貿易，因而崛興^⑥。至清季中英鴉片戰爭後，開五口通商，而福建一省，獨佔二口，此即福州與廈門，此後西商、西教雲集，成為近代吸納歐美文化，得開風氣之都市^⑦。

④ 桑原隲藏著，馮攸譯：《中國阿拉伯海上交通》(台北：商務人文庫，1971)，頁432—49；並參李東華：《泉州與我國中古的海上交通》(台北：學生書局，1986)，頁131—224；此外，泉州重要支港，興於唐宋而大盛於明代，時與漳州月港並稱，參《安海港史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1989)一書。

⑤ 參全漢昇關於中菲絲銀貿易的研究，載於氏著《中國經濟史論叢》(香港：新亞研究所，1972)，上冊，頁417—473；並參陳自強：〈論明代漳州月港的歷史地位〉，《海交史研究》，5期(1983)，頁90—97。

⑥ Ng Chin-Keong, *Trade and Society: The Amoy Network on the China Coast 1683—1735*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95—152；又參陳國棟：〈清代中葉廈門的海上貿易(1727—1833)〉，吳劍雄主編：《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台北：中研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1991)，第4輯，頁61—100。

⑦ 李國祁：《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閩浙台地區1860—1916》(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2)，頁110—125，129—143；王爾敏〈廈門開關之港埠區畫〉，《食貨月刊》，復刊4卷6期(1974)，頁221—232；張烘祥：〈福州開埠初探〉，《南開史學》，2期(1992)，頁100—109。

由此可見，福建省民憑藉海通之利，得以爭雄海上，福建民間社會逐漸湧現一批船工、漁戶、海盜、海軍、海商及移民海外之華僑^④，歷代以來，相繼涉險於風濤巨浪之中，或為謀生，或保海疆，或興業拓殖，從而使本省成為“海洋中國”之典範，而與內陸省份成一強烈對比。

其次，就中國文化發展史而言，福建文化，位居顯要；自晉室南渡，中原文化隨之南移，八閩學術文化由是起興，人材輩出，故論者謂：“福建文化萌芽於晉，發達於唐，而盛大於宋。”^⑤此即朱文公所謂：

④ 關於船工，可參林仁川：《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貿易》（上海：華東師範大學，1987），頁354—359；關於漁戶，參《福建通紀》（1922）（台北：大通書局，重印本，1968），（二），頁697—698；海盜則參張中信：〈清嘉慶年間閩浙海盜組織研究〉，《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同注④，第2輯，頁161—198；海軍則參高榕：〈閩系海軍的形成發展衰落史話〉，《福州文史資料選輯》，7輯（1987），頁113—158；關於海商，宋代可參斯波義信：〈宋代における福建商人の活動との社會經濟的背景〉，《和田博士古稀紀念東洋史論叢》（東京，1960），頁494—498；明代可參傅衣凌：〈明代福建海商〉，《明清時代商人及商業資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頁107—160；福建華僑可參Wang Gungwu, "Merchants Without Empires: The Hokkien Sojourning Communities", in *China and the Chinese Overseas*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1991), pp. 79—101；林金枝：〈近代福建華僑投資企業的發生和發展〉，《近代華僑投資國內企業史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頁78—96。

⑤ 陳易園：《福建文獻研究講義大綱》（福建協和大學，1937—1938），頁12。

“天旋地轉，閩浙反居天下之中”^⑩，就此而論，宋明理學，福建即卓具名聲，其時，將樂之楊時（1054—1135），建陽之游酢（1053—1123），立雪程門，程顥遂有吾道其南之語，理學由是入閩，下傳延平羅從彥（1072—1135），及李侗（1093—1163），號稱理學大家；楊、羅、李三人其後被合稱為“南劍三先生”；而最重要則為移居建陽之朱熹（1130—1200），一代宗師，建立“閩學”一派，不但下開福建朱子學，而且成為中國文化正統之代表者。而朱子學發展至浦城真德秀（1178—1235），著《大學衍義》一書，為明太祖所重視，遂成以後帝學之所本。

就史地之學而言，莆田鄭樵（1104—1162）之《通志》，建安袁樞（1131—1205）之《通鑑紀事本末》，自成一家，列屬史學名著，開典制通史及紀事本末體例之先河；光澤何秋濤（1824—1862）撰述《朔方備乘》，下開西北史地之學風。

就集部聲韻方面而言，長溪薛令之，晉江歐陽詹，浦城楊億（974—1020），以及崇安柳永（984？—1053？），皆以詩詞文字揚名於世；而建安吳棫（約1100—1154），連江陳第（1541—1617）之音韻小學，亦為識者所推崇，閩縣陳夢雷（1650—1741），主編《古今圖

⑩ 鄭貞文：〈福建文化過去的光榮〉，《協大校慶增刊》（1941年），頁6—7；朱文公語轉引於此。

書集成》一書，卷帙浩繁，以“百科全書”形式，結集網羅傳統中國文化，鉅細靡遺，貢獻至大。

及至晚近，侯官嚴復（1854—1921），閩縣林紓（1852—1924），兩人並出，翻譯西書，溝通中西文化，於近世位居首席，而嚴譯中之警句，“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更為中國近代思想上之存亡自覺之名句^①，影響尤大。由此可見，福建之於中國文化，猶如夜空上之晨辰，異常燦爛奪目；此亦“海濱鄒魯”譽稱其來之有自。

福建之於中外交通及中國文化史上之表現，顯然異常突出，實具研究意義；由是激發學者，投身此一領域，從事研究，成果日漸增多而自成體系；本文即透過對中外史家有關福建區域研究之出版作一初步整理^②，藉此透露福建區域研究之動向及成績。

① 唐宋福建文化地位提升，可參王耀華主編：《福建文化概覽》（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4），頁18—20，252—322；又張家駒：《兩宋經濟重心的南移》（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頁153—154；福建朱子學之發展，可參高令印，陳其芳：《福建朱子學》（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一書；正文所列對於中國學術，文化具有貢獻之著名福建學者及其生平，可參鄭貞文，同前注，頁6—7；並參鄭貞文：《閩賢事略初稿》（福建省政府教育廳，1935），頁4—5；《福建歷代名人傳略》（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關於嚴復名句之重要性，參王爾敏：〈清季智識分子的自覺〉，《中國近代思想史論》（台北：華世出版社，1977），頁99—100。

② 關於福建研究書目，始見於金雲銘編：《福建文化研究書目》，《福建文化》，1卷1期至4期（1931—1932）。

二次大戰後，西方盛行區域研究，而中國研究亦由此勃興；其中美國人類學家 G. William Skinner，利用“中地理論”(Central-place theory) 研究中國集鎮、城市，建立類型分析；並以地文特徵及市場網絡，劃分中國成為九大經濟巨區，提出巨區於長時段中所出現之經濟週期，作為解釋王朝興替政治現象之取徑；稱之為“區域系統法”(Regional System Approach)；流風所播^⑬，區域研究遂成中外學者群相注目之熱門研究領域。其中尤以明清至民國時期全國跨省區(華北、華南、長江流域)、省、縣、市等相關之政治、經濟、社會史之研究，最為蓬勃，而有關研究成果，論者已多^⑭。然其中福建省、府、市之歷史課題，亦為中外學

⑬ 國人對於 G. William Skinner 理論之推介，始見於溫振華，參溫振華：〈施堅雅(G.W. Skinner)之中國社會研究〉，《民國以來國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論文集》(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系，1992)，中冊，頁1095—1112；張廣達：〈美國討論施堅雅的區域系統觀的幾篇評論〉，《漢學研究通訊》，11卷1期(1991)，頁25—29；近日國內學者亦將施堅雅之重要理論文字翻譯結集出版，見王旭等譯：《中國封建社會晚期城市研究》(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

⑭ 艾愷(Guy Alitto)：〈論目前在西方的中國地方史研究的趨向〉，《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2期(1983)，頁439—468；梁元生：〈近年來美國之中國近代史研究趨勢〉，《中國近代史研究新趨勢》(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1994)，頁110—114，梁氏指出近日以上海市之研究最為熱門。此外辛亥革命及軍閥時期，有關省區研究成果最為突出，參李金強：〈辛亥革命的研究〉，《六十年來的中國近代史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下冊，頁800—803；又參周子峯：〈戰後中國大陸及西方的中國近代軍閥研究〉(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未刊稿，1995)，頁8—17。

者所關注，研究眾多，琳瑯滿目，就現時可見，較為重要之著述；古代史方面，則有 Edward H. Shafer 研究五代閩國史^⑤；桑原隲藏、羅香林研究宋元之際西域人蒲壽庚及泉州之關係^⑥，斯波義信對於宋代福建海商之研究^⑦，李東華抱“略人所詳，詳人所略”，論述唐、宋、元、明中古泉州於中外交通與貿易之興衰史實^⑧，蘇基朗研究宋代閩南地區經濟發展，以及唐宋泉州之史事、都市及交通之考論^⑨，而同類研究，尚有 Hugh R. Clark 以宋代泉州作為海運貨運貿易中心，探討閩南社會經濟之發展^⑩。就明清史方面，則有 E. S. Rawski 從農業商業化角度討論十六世紀福建漳州及建寧二府農村經濟之變

⑤ Edward H. Shafer, *The Empire of Min* (Vermont: Charles E. Tuttle Company, 1954). 該書分別從福建之景物，閩王國，歷史發展，經濟，工藝，文學及宗教各方面論述五代閩史。

⑥ 參蘇基朗：《唐宋時代閩南泉州史地論稿》（台北：商務印書館，1991），頁1—35。

⑦ 斯波義信，同注⑤，其研究已有英譯，見 Shiba Yoshinobu, Mark Elvin Trans., *Commerce and Society in Sung China*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70), pp. 181—202.

⑧ 李東華，同注①。

⑨ 蘇基朗，同注⑥，So Kee-long Billy, "Economic Developments in South Fukien, 946—1276" (Ph.D. dissertation,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1982)。

⑩ Hugh R. Clark, *Community, Trade, and Networks: Southern Fujian Province from the Third to the Thir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遷^②，張彬村對於十六世紀福建海上貿易及商人之研究^③；以及吳振強探討盛清廈門憑藉海洋貿易，促成其興起之歷程^④。就近代史而言，最重要莫如李國祁利用“西方衝擊中國回應”，及“現代化理論”模式，研究1860至1916年間福建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變遷，展示出近代福建發展之過程；李氏稍後並且下延至民國時期福建政局，政制、人口、財政及貿易等專題研究^⑤；其次，Ellsworth C. Carlson 關於1847至1882年間西差會派遣傳教士至福州傳教活動之探討^⑥；以及林文慧利用“教務教案檔”研究清季福建之教案^⑦。此外，Robert Gardella 研究十八至二十世紀上半葉福建茶貿易興衰史^⑧；而享有盛譽之英國人類學家 Maurice Freedman 透過田野研究方法，探索福建宗族組織之結構與功能，

② Evelyn S. Rawski, *Agricultural Change and the Peasant Economy of South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③ Chang Pin-tsun, "Chinese Maritime Trade: The Case of Sixteenth-century Fukien" (Ph. D. dissert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1983). 並參氏著：〈晚明福建的海外貿易與地方經濟發展〉，《國史釋論——陶希聖先生九秩榮慶祝壽論文集》（台北：食貨出版社，1987）。

④ Ng Chin-Keong, *op. cit.*

⑤ 李國祁，同注①，又《民國史論集》（台北：南天書局，1980），頁57—309。

⑥ Ellsworth C. Carlson, *The Foochow Missionaries 1847—1880*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⑦ 林文慧：《清季福建教案之研究》（台北：商務印書館，1989）。

⑧ Robert Gardella, *Harvesting Mountains: Fujian and the China Tea Trade, 1757—193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尤為學界所注目^②。由此可見，1949年後海外學者（包括華裔），均對福建研究，投下心力，並湧現一批具有價值之研究成果。

然而，綜觀國內外福建研究之發展，仍以福建省之研究成果最為重要，蓋因無論在教研機構，學者及出版方面，質量俱備，兼且自1979年後，中國實施改革政策，福建被列為特區省份，對外開放，在經濟蓬勃發展和中外學術交流頻密之背景下，該省之福建研究，更形“發達”；就以刊物為例，除該省研究福建史之兩大重鎮——福建師範大學（簡稱福師大）及廈門大學（簡稱廈大）出版學報及《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外，福、廈兩地之教、研、文化機關，先後出版《福建論壇》、《福建史志》、《福建文博》及《福建學刊》，大量刊登福建史、地、文、哲及現況之研究成果；福建區域研究，一日千里。故此，撰寫福建區域之研究史，福建一省相關之學者及其研究動向，未容忽略，而本文重點亦在於此。

福建省之福建區域研究，起自地方志之編修。我國史學傳統，地方素重修史，整齊記錄，無形中為區域研究留下大量寶貴史料^③，福建省修志，論者謂始於

② Maurice Freedman, *Chinese Lineage and Society: Fukien and Kwangtung* (London: The Athlone Press, 1966).

③ 朱士嘉：〈中國地方志淺談〉，《文獻》，1輯（1979），頁33—47。